

看的辯證： 展覽櫥中的香港

• 任 海

這文化空間……名為香港……一個由不同速度與時間所組成的不規則空間；一個特別抗拒線性或時間性表述的空間。

Ackbar Abbas ①

本文要探究的是，在從英國殖民地過渡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社會處境中，香港作為一文化空間與它作為歷史再現之間的關係。我們首先探討的，是使概念獲得具體指涉的展品之詮釋力與對世界有所指涉的展覽之間的關係。本文將追溯本世紀初葉的展覽會觀念，特別論及如何運用展品及展覽會去宣揚中國民族主義、英國殖民主義及香港資本主義。「以展示來述說」(Telling-through-showing) 成為規範香港日常生活的展覽複合體，尤其製造業發展出來視覺傳播技術後。透過排列事物 (主要是工業展覽中的展品)，中國民族主義、英國殖民主

義及香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得以例解。在60年代，「以展示來述說」的意識形態從資本主義擴展到文娛及文化領域。

在對「以展示來述說」作歷史分析後，本文會分析歷史再現及產生香港身分認同之間的關係。第二部分詳細考察博物館在敘述想像的香港社群史中所扮演的角色，集中探討香港歷史博物館及其長期性的展覽項目：「香港故事」，以說明香港在該展覽中如何被表述為一「自然化」的範疇。在這「故事」中，「城市」被說成是香港「本質的」標記；相對而言，「農村」的表述只是為了襯托「城市」。

* 本文英文稿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Culture, Media and the Public”國際會議(香港，1997.1)中宣讀，經會議主辦者「香港文化研究計劃」同意在本刊以中文先行發表，謹致謝意。

構築着博物館展覽的城鄉對列的邏輯，也同樣出現在本文第三部分的焦點——古蹟教育中。在這部分，本文會分析作為港府古蹟教育計劃其中一環的新界屏山文物徑，如何透過屏山的歷史建築轉變空間的意義，以及由文物徑所產生的論說如何同時觸及本土認同建構的協商。本文還會討論由屏山鄧氏所建立的本土另類博物館展覽，以揭示出歷史表述與本土處境之間的複雜關係。

在結語部分，本文將歷史再現與香港認同的產生之間的關係，放在由英國殖民地到中國特別行政區的歷史過渡之脈絡中來討論。尤其關鍵的是，對香港群體認同的歷史表述，不單受制於英國及中國殖民主義，同時亦受香港跨國資本主義的影響。

以展示來述說

展覽一方面涉及制訂和修改物品的內涵，同時也涉及規管社會的過程，使對物品內涵的制訂和修改成為社會論述不可分的一環。公開的展覽會及節慶形成了一個既超越意識形態，又規管公眾的社會空間。在香港，包括述說與展示的展覽會觀念，首先是由工商業的展覽會發展起來的。

成立於1933年的香港中華廠商聯會，在發展意識形態的視覺表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該會在1937年到1949年間，舉辦過七次大型的「國貨」展覽，它們都緊緊於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而港府對此亦採取容忍態度。舉例來說：獲國民政府支持的1939年展覽分為6個展區，分別是：民族、民權、民

生、自強、自由、自治^②，而這正是基於國民政府的三民主義原則。

「以展示來述說」的展覽複合體把表述技巧與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相連。此複合體把工業產品轉化成文化產品，工業製造商因而成為了文化製造商。1939年的展覽會組織者聲稱^③：

我們中國人的產品數量正與日俱增，其品質亦精益求精。把它們更廣泛地介紹給同胞認識是很重要的。我們如何能完整地認識那麼多產品呢？這實在不容易。所以我們才組織那麼一個展覽會，好讓全國的產品都能一起向公眾展示。這是認識國貨的最好方法。

展覽會的目的，在推廣香港華人資本家的產品及中國製造的產品。國貨包括了絲綢、綿織品、電器、玩具、化妝品、藥物、糧食、皮革、橡膠、玻璃、雕刻、傘、文具、火柴、牙刷及肥皂。國貨觀念把工業製品與「國家」連結在一起。民族主義不單在消費國產製品的活動中而且亦在展覽的過程中得到落實。在此所呈現的特定意識形態，乃是由中國工業發展所徵示的現代中國民族國家的進步（儘管它是在英國殖民地政府統治下的創作）。

作為英國殖民地，香港亦參與在英國本土舉行的展覽會。早在1886年，英國政府要求香港政府參加在倫敦舉行的「殖民地及印度展覽會」。香港也有參與1924至1925年在溫布萊（Wembley）舉行的「大英帝國展覽會」。英國政府用展覽會作為「形成以帝制體系為中心觀念的具體媒介」^④。香港的參與是要表明其「作為大英

1937年到1949年間，香港中華廠商聯會舉辦過七次大型的「國貨」展覽。國貨觀念把工業製品與「國家」連結在一起。民族主義不單在消費國產製品的活動中而且亦在展覽的過程中得到落實。

帝國大家庭其中一員的愛國熱情」。1925年的展覽會結束後，帝國研究所開始收藏香港出口製品的樣本。

香港在1948年首度參與在倫敦舉行的「英國工業博覽會」。香港的博覽會委員會主要由中華廠商聯會組成，志在以「工業、銀行等類的項目，顯示殖民地的成就。在展覽會中，為海外買家提供香港的產品與服務」，並接觸英國的工業家及拜訪英國的工廠^⑤。400平方尺的展覽空間放滿了「優秀的實用產品」，例如紡織品、帽、橡膠製品、食品、醃薑、煙草、手電筒、肥皂及油漆等。這類商展會亦「教育」香港代表，並帶給他們對工業的新展望，進而影響他們看待本土工業的態度。該委員會視「英國工業博覽會」是「帝國的核心，而香港是其中不可缺的單元，那些以香港為家的人在這裏是受到歡迎的，因為他們是我們稱為帝國的那更大的整體的其中一員」^⑥。

香港參與在英國的展覽，是殖民地教育的一環。表述香港時所用的觀念，明顯與英國殖民主義有關。這不單只是因為香港在英國被表述為大英殖民帝國的一部分，它更被表述為是與中國分離的實體。這種香港的本土認同取向，仍可見諸1949年在香港舉行的國貨展覽會中。

在60年代，「以展示來述說」的表述方式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文娛活動，而這個年代正是香港認同出現的時期。舉例言之，在1967年的「暴動」中，香港人視自己為與殖民地政府及其中國祖國皆有分別的另一個社群^⑦。在60年代後期，港府開始回應香港本土所產生的社會問題。

在1967年「暴動」後，港府決定解決勞工問題，例如就業及健康等問

題，並花更大的努力去處理香港本地人的文娛康樂活動。這一政策促使港府資助一系列文娛康樂活動，如香港節、擴建公園、運動設施、圖書館、博物館及劇院等。香港市政局亦於1973年正式成立，其主要功能是管理環境衛生、文康服務及「文化」，其工作範圍從街道清潔、火葬場運作、食物檢查、菜市場管理、以至娛樂設施如公園、游泳池、體育館、圖書館、劇院及演唱會場等。

港府對香港日常生活的政策是旨在維持對香港人的控制，但事實上，這也在無意之間容忍了香港歸屬感的發展。例如，第一屆香港節在1969年12月舉行，它營造了一種閒適的昇平氣氛，同時亦使香港人生出一種甘苦與共的感覺。《華僑日報》就香港節作出如下社論^⑧：

香港不是一個國家，但卻是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香港市民其實絕大多數是中國人，但卻是香港市民。在這種情形下，香港之地位、文化精神、風俗習慣都與中國有密切關係，或者可以說是分不開的。我們苟能發揚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貫徹中國的道德，視香港為第二故鄉，深信必能漸漸建立香港的精神文明，改良香港的風俗習慣，使到香港前途之發展更為美滿。簡單一句話，就是凡屬在香港生活，在香港工作的市民，都應該愛護香港，關心香港，將個人與香港的關係拉得更為密切。

所以，「香港」變成一個建構歸屬感的場所。系列的節日及展覽會形成了「香港」的文化領域，而它慢慢演變成差異的空間。

60年代是香港認同出現的時期。舉例言之，在1967年的「暴動」中，香港人視自己為與殖民地政府及其中國祖國皆有分別的另一個社群。這在無意之間促成了香港歸屬感的發展。

博物館與「香港故事」

自城市博物館和藝術館在1962年落成以來，香港的博物館便成為教育公眾的工具。它們與墳場、火葬場、殯儀館、娛樂廣告、環境衛生、食物衛生、小販管理、市場管理等等被列入同一個範疇。政府的博物館條例竟屬「公共衛生」法令。博物館被政府視作日常生活的一環，因而博物館與政府的連繫多於與公眾的關係，故它其實不是公共文化的一部分。本節將考察香港歷史博物館在表述香港史時所擔當的角色，探討它如何透過長期展覽「香港故事」，建構一「自然化」的範疇——香港。

香港歷史博物館於1975年正式落成，目的是「記錄」及展示「塑造現代香港的歷史、社會及文化變化」^⑨。博物館在保存及展覽本地歷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自80年代中期以來，博物館主持了多項與本地史關係密切的計劃。1987年，博物館推出一項名為「香港人及其生活」的兩年計劃^⑩，這是香港第一次強調「平民百姓」的歷史。至於有關香港史最重要的計劃——「香港故事」，則是始於1991年的長期展覽。展覽的目的是希望「能喚起市民對香港歷史的興趣及加深他們對香港六千年蛻變歷程的認識」^⑪。這個佔地1,302平方公尺的展覽，是在本地舉行的同類活動中規模最大的。它記述了香港自新石器時代到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為止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包括「自然環境」、「早期居民」、「農村」、「城市——割讓及早期發展（一八四一年至一八五一年）」、「城市——社會的發展及地區的拓展（一八五二至一八六二年）」、「城市——貿易、工業的發展及社會組織的建立

（一八六三至一八九三年）」、「城市——城市新方向：思想及生活的革新（一八九四至一九四一年）」、「日治時期（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及「當代香港」。展覽的主題是「城市」的發展，佔了展覽場地總面積超過三分之一。該展覽通過「歷史圖片、檔案文件、農具和模型，並輔以視聽和多元感覺設備、立體景觀及街道布景，展示香港如何由細小漁村發展成為大都會」^⑫。

這展覽建構了一個「鄉城演進」的架構，並以此使「香港」成為一自然化範疇。在這「故事」中，「城市」被塑造成「香港」的基本標誌。「城市」被述說為都市化的同質過程，始自歐洲人的來到及他們發現了香港的「農村」。展

看的辯證： 109
展覽櫥中的香港

在「香港故事」中，「城市」被塑造成「香港」的基本標誌。「城市」被述說為都市化的同質過程，始自歐洲人的來到及他們發現了香港的「農村」。更重要的是，香港不是因為它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而被發現，卻是因為它與中國的連繫。



香港歷史博物館內的拱廊設計，採納了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商品拜物教：它增加參觀者對消費拱廊內每一單元所提供的資訊的欲望，但它卻又不提供真正出售的商品。再者，透過拱廊的設計，博物館建立了一組有關「香港」城市「不能被遺忘」的意義記憶。

覽中有一題為「補給船隻食水之地」的說明文字，解釋了這個發現的過程：

一七五七年之後至一八四〇年代五口通商以前，廣州是唯一對外開放的商港。駛往該市的外國船隻，均需經伶仃島和虎門，沿珠江前往。這些船隻經長途航程後，通常會在香港停泊，補給食水。南丫島、鴨脷洲及石排灣環繞着的港灣，是一個船隻寄碇的天然良港。海員們在現今華富邨旁的一條瀑布汲水後，便續航前往廣州。該停泊點附近有一條香港村，西方人誤以為它是整個島的名稱。

這個「發現」的論述把香港的「農村」跟以歐洲人時空為同質中心的世界史相連起來。在這種「發現」的論述中，歐洲人不只發現了一個水源，也發現了島上的原住民。更重要的是，博物館把香港島定位在對中國奇妙的「發現」的脈絡中。在展覽中，如果不是因為歐洲人的發現，香港是無法進入世界史的。再者，在這表述中，香港不是因為它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而被發現，卻是因為它與中國的連繫。香港之所以被發現，是因為中英鴉片戰爭(1840-1842)，戰後，香港被割讓給英國，在此香港開始進入「城市」的歷史：土地買賣、歐洲貿易公司的設置及歐洲與中國人口的遷進。「都市化」的表述是與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Lindsays Company，顛地洋行(Dent & Co.)，Russell & Co. 等公司連在一起的。因此，商業，尤其是英國人商業的出現，成為都市化的標誌。再者，這一過程又只見於英國人的聚居地，即港島上的維多利亞城。歐洲旅行家／藝術家的「歷史畫」被用作「真實地」

呈現維多利亞城的主要媒介。參觀者所接觸到的，其實是歐洲人所描繪及理解的「城市」。「城市」的實貌，是基於對再現的表述。

「為了使觀眾明瞭十九世紀末年香港的風貌」^③，展覽會場重構了一條「街道」，更為具體地展示了「城市」的發展。根據昔日照片影像重構的「這條街道把中式店鋪與歐式建築對列，重塑了十九世紀的典型街景」^④。街道採取了拱廊式的表述方法，使參觀者儼如置身於街道的「購物者」。街道一旁的西式建築包括屈臣氏(A. S. Watson & Co.)的正門，以及Lammert Brother、Hong Kong & Kowloon Wharf & Godown Co. Ltd.、連卡佛百貨公司與天祥洋行(Lane Crawford & Co. Department Store and Dodwell & Co., Ltd.)及香港上海匯豐銀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等公司的展示窗。參觀者不單可以從展示窗中看到這些公司的製品，甚至可以進入每一單元內細看更多展示的物品。這種空間的布局，鼓勵參觀者接近博物館所提供的相關訊息，包括郵遞和電報設施、船務、銀行、電力、填海、水庫、交通等。反之，在街道另一旁的中式商鋪，博物館提供了一系列實物大小的建築物正面，包括茶樓、鹹魚鋪、會館、賭檔、當舖、算命攤及一揉合中西式建築風格的房舍，乃至一條中環的後巷。這些陳列品所呈現的是本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娼妓及賭博這些港府面對的社會問題被清楚凸顯出來。當參觀者走在街道的這一邊時，只能看到在這些建築物前面所展示的陳列品。

在拱廊式的表述中，有三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課題：拱廊本身的意義、博物館的拱廊設計及拱廊與二十

世紀資本主義的關係。莫爾斯 (Susan Buck-Morss) 曾指出，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在二十世紀初曾以拱廊設計作為批判資本主義的工具^⑮。對本雅明來說，十九世紀的拱廊是「內在意識的物質摹本，甚或是集體夢想的潛意識」^⑯。本雅明將外在的經驗與內在的記憶相結合以批判「小資產階級意識的所有錯誤」：商品拜物教、物化、世界的「內在性」(world as “inwardness”) 及其諸如「流行時尚、娼妓及賭博」的烏托邦夢想^⑰。本雅明的拱廊設計是為了展現一集體的歷史：「被遺忘的生活。」^⑱

香港歷史博物館內的拱廊，採納了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商品拜物教：它增加參觀者對消費拱廊內每一單元所提供的資訊的欲望，但它卻又不提供真正出售的商品。博物館的拱廊設計，幾乎把商品崇拜的物質方式轉變為文化方式。再者，透過拱廊的設計，博物館建立了一組有關「香港」城市「不能被遺忘」的意義記憶。換言之，「香港」的「城市」被導進想像的集體歷史潛意識中。在步入拱廊的同時，參觀者進入了香港城市的潛意識記憶。拱廊作為城市的載體，並不是中性的，因為拱廊本身就是西方大都會的全球性、同質性的特徵。所以博物館的拱廊設計是與西方帝國主義，乃至於在這個例子中所顯現的殖民主義意識形態密不可分的。

香港被表述為「城市」或「大都會」，但它並不是指任何大都會而是專指西方式的。香港作為大都會與香港作為全球系統 (包括全球史) 之間的連繫，在展覽中顯得十分明確。然而，在展覽中，香港的大都會形象與它的殖民地處境之間的連繫從未被明顯提及。把「香港」建構成大都會，是

西方大都會之論述在日常生活中體現的一例。

博物館把「香港的居民及生活」作為「從漁村到重要大都會的香港發展」的重要主題，它透過把人放在「城市」的脈絡下來達成此意圖。拱廊只不過是建構「人」與城市關係的其中一個例子。事實上，香港的「農村」形象只是作為對城市論述的陪襯。

「農村」作為「城市」的映襯，首先見諸對「漁民」的表述。博物館透過展品的陳列，說明了帆船、海神崇拜的角色及漁民的生活形態。關鍵展品是一艘船屋。參觀者能看到它的內觀及一個在縫衣服的婦女模型。歌曲及水聲的錄音反覆播放，八幅黑白巨照顯示船隻及船民的活動 (如在搖船)。「農村」的第二個展覽環節，集中在介紹早期香港居民的「謀生方式及生活形態」，其中包括了農耕、養珠及產香，此外便是宗族組織、儀式及信仰。「農村生活」的標籤說明這樣寫：

十九世紀初期，新界基本上是農業區，山間有數個廣闊的山谷、很多塊細小的農地，同時零星夾雜着數個市鎮。夏秋二季，是每年兩造食米收成期。農民一般至少花上半日行程，抬着農產及禽畜到市鎮出售或交換。

農村生活，須循着特定的模式。除種米外，還舉行一系列的農村活動，以應族人的需要，這些活動計有遵奉祭祖儀式、管治祖業 (包括屋和田地)、照顧長幼 (例如給子女供書教學、奉養年長者)、協助籌辦紅白二事、修葺祠堂等。

這一說明被置放在一重構的村屋內，「以闡明十九世紀香港郊區的農村生活」。在此所表述的時間，即十

十九世紀村屋與十九世紀拱廊式城市街道同時並列。然而，名為「新界」的這塊地緣政治疆界，在十九世紀末期以前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展覽中所宣稱的香港「農村」只是一種想像。

由「農村」到「城市」的演進，香港的「農村」形象反映出英國殖民地誕生前的年代，而其「城市」形象則繫於英國的殖民化。香港的過去是挪用中國的過去，使之成為香港自然史的一部分。當「香港」成為一自然化的範疇，它也成為一地緣政治範疇。

九世紀，是與展覽的時間主調不一致的。在這一演進的時間架構中，農村被建構為城市發展前的早期階段。而代表「農村」的主要項目，即村屋，產生出明顯的城鄉對比效果而不是一線性的聯繫。這十九世紀村屋與前面討論的十九世紀拱廊式城市街道同時並列。但這矛盾的共時性，卻揭示了在展覽中城鄉演進架構的虛構的種種現象。此外，這種共時性也把新界轉化成香港的「農村」形象。但這塊名為「新界」的地緣政治疆界，在十九世紀末期以前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展覽中所宣稱的香港「農村」只是一種想像。傢具、食物容器、牀、母子人像、衣服、農具、盤籃等展品，皆被用以構架一個想像出來的香港。

當「農村」形成一想像的空間時，人物也給加進去，這包括了四個民系：本地、客家、蜑家及福佬。在展覽中，他們是以服式來區別的。在這一單元，廣播系統介紹每一民系時均會播放一首歌曲。歌曲是據展示的先後次序來播放的，分別是客家、蜑家、福佬、本地。當歌聲響起時，聚光燈便把焦點射向相關族群的展品，而照射其他族群的燈則轉暗。燈光就這樣隨着錄音作相應的轉移，機械裝置的運作便指引着參觀者。播音、照明、展品及對這些組件的安排，使參觀者進入香港「農村」人的世界。

這想像出來的「農村」，挪用自1898年前的中國廣東省南方。也許更適當的說法是，香港的「農村」形象來自於十九世紀的中國農村。但展覽中卻沒有清楚說明，從廣東省南方農村到港英殖民下的新界的社會變遷。當現行的香港地緣政治邊界逐漸被確定後，廣東省南部亦逐漸在英國殖民化過程中被塑造，並被轉化為現時香港

整體的不可分離的一部分。「農村」模式的表述，不可能對這一過程進行詮釋。根本來說，這一表述侵蝕了博物館建構現時香港集體認同的努力。

為了表述從「農村」到「城市」的發展，博物館把「香港」變成一自然的範疇。「香港」一詞既可單指香港本島，即還沒有包括新界，也可指包括港島、九龍及新界。博物館所製作的「香港」主題，是超過現時香港的地緣政治邊界的。換言之，「香港」與英國殖民地並不相同，它是由「城市」與「農村」構成的。由「農村」到「城市」的演進，香港的「農村」形象反映出英國殖民地誕生前的年代，而其「城市」形象則繫於英國的殖民化。香港的過去是挪用中國的過去，使之成為香港自然史的一部分。

當「香港」成為一自然化的範疇，它也成為一地緣政治範疇。歷史重寫的技巧造就它的形成。在敘述歷史的過程中，博物館機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香港的「自然化」，創造出群體的特有認同。香港的空間住滿了由中國移居及現時香港版圖內的原居民。

古蹟保存、文物教育及其本土處境

歷史表述為香港創造了新的時間性。在此，一切社會時間被轉化為一中心化的時間，各類社會空間皆被轉進一特定的場合，不同類別的人口成為一群整體。表述歷史「不斷地修補連結過去與現在的結構的缺口，以確保一種戰勝時間暴力與分割的『意義』。它為參照物及共同價值創造出一個場所，藉此確保群體的一體感及『象徵的』可溝通性……它把各種分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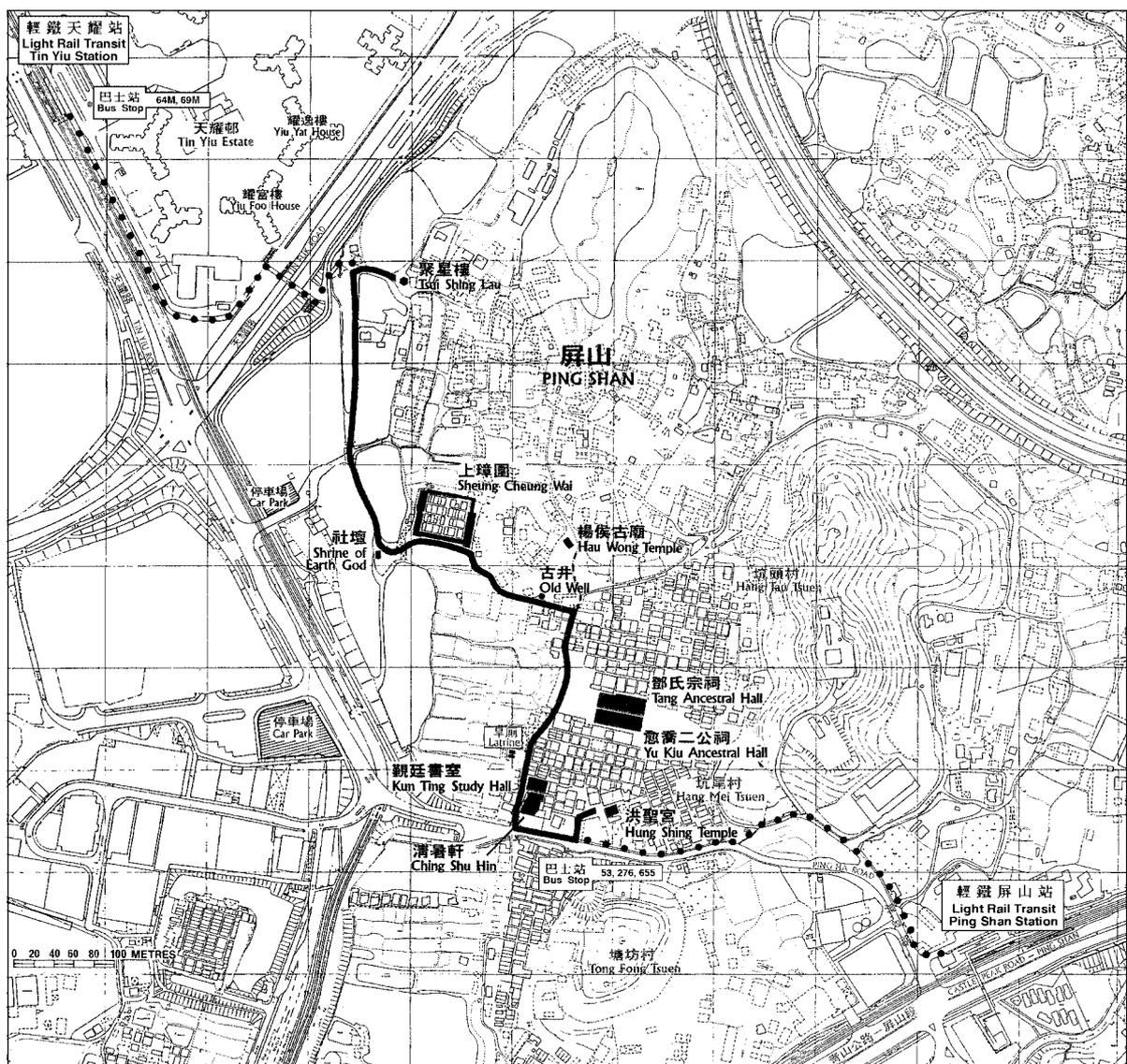
的人與事重新聯合於一體之中，並藉表述本身來顯現」^①。

歷史表述不單只涉及博物館，也與古蹟保存有關，後者在塑造一集體的香港認同上扮演着極其重要的角色。古蹟保存為歷史表述提供資料。保護那些作為歷史文化遺產具體表徵的歷史建築，無疑有助培養強烈的歸屬感^②。古物古蹟辦事處舉辦會議、展覽，並為學校設計課程計劃。規劃香港文物的其中一項最重要舉措，是重組新界屏山一系列的歷史建築，並將之闢為屏山文物徑，這計劃分別獲得屏山鄧氏、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及

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贊助。香港旅遊協會亦有組織旅行團參觀該文物徑。

屏山文物徑把古蹟保存與香港集體認同的建構計劃相聯。這文物徑成為一種旅遊方式，即在特定的社會空間內操控人群的活動。作為抽象概念範疇的「香港」，便在觀光活動中被傳遞。1993年12月12日，該文物徑由港督彭定康主持開幕典禮。古物古蹟辦事處開放該徑，是因為它「將多座典型中國傳統建築接連起來，信步可達，使市民只需花半天遊覽時間，便可領略到過往新界的傳統生活面貌」^③。

屏山文物徑(圖中粗線部分)把古蹟保存與香港集體認同的建構計劃相聯。這條文物徑成為一種旅遊方式，即在特定的社會空間內操控人群的活動。作為抽象概念範疇的「香港」，便在觀光活動中被傳遞。



藉由與古物古蹟辦事處充分合作，屏山鄧族向市民開放自己的產業，從而參與了官方所建構的香港歷史。不過，該族亦尋求他們自己對本地史的詮釋。他們讓參觀者對鄧氏，尤其重要的是對個體的生活有更多了解，這與文物徑以集體為焦點很不同。

文物徑上的歷史建築意味着政府所定義的「市民的興趣」。它們包括「香港唯一的古塔」、「本港最大的祠堂」、「一古圍村」及「專為村中子弟準備科舉考試而建的書室」。路徑是經過謹慎挑選的。文物徑北端有一座建築：一座當地居民已棄置不用的公所，它象徵着1899年本地人對英國人的反抗²⁰。可是，它卻沒有被納進文物徑內。儘管該建築物的內部已淹水，但它其實還保存着不錯的外觀，只是作為一個反抗的象徵，它顯然不能被港府納入對香港史的表述中。紀念，其實是一個選擇的過程。被排除的部分其實包含了血迹斑斑的見證，「它是引起社會困窘的建築」²¹。當然，當地居民仍然憶及它的作用，它的意義還沒有從社會記憶中被抹掉。

在歷史保存的脈絡下，赫茨菲爾德 (Michael Herzfeld) 區分了兩類時間：社會時間及紀念時間。「社會時間是日常經驗的材料……那是賦予事件真實的時間……。相反來說，紀念時間是化約的及通稱的。它化約社會經驗為集體的期望，其焦點指向由類別及固定類型所建構的過去。它的極端形式是民族國家的時間脈絡。」²²所以，被重構的時間便不再是碎裂的。政府把本地廟宇、民居、祖祠及書室重新置放在文物徑中，用以創作出一個新的時間架構，即紀念時間。隨着社會時間轉化為紀念時間，空間的意義亦發生改變。屏山成為一「古蹟社區」，吸引了來自香港及世界各地的遊客，它在古蹟保存的基礎上為建構「香港人」社群作出了貢獻。

空間意義的改變，是一個在原居民與政府之間持續的談判過程。對當地的鄧氏家族來說，空間的意義是來

自於他們對風水 (即空間秩序) 的信念。組成屏山文物徑的建築原是鄧氏家族所有，主要的建築包括觀廷書室、鄧氏宗祠、愈喬二公祠、聚星樓、上璋圍，共同形成一鄧氏家族用以自衛及保存風水的建築群。這些村落及建築建於不同時間，但它的設計主要在維護風水。鄧氏家族相信，當本地居民依從空間秩序的指示時便得到保佑，否則就倒楣。族中長者鄧聖時說：自從英國人來了這一帶，並在兩座宗祠後的主山頂上蓋了一座警署後，整族都走向衰落。對鄧氏家族來說，警署破壞了空間的完美結構並使其意義發生轉變。自從英國人在1899年佔領屏山，原居民的風水信仰便成為一種政治鬥爭。1898年3月28日，警隊的英裔高級警司要在屏山建立警署時，原居民便因為這座建築會損害屏山的風水而與他爭論²³。布政司駱克 (Steward Lockhart) 於是通告長老們，警署會建在「最合宜的位置」上²⁴。

自從英國人統治新界，鄧氏家族為了維持該空間的原先意義而不斷進行抗爭。故保存古建築，可以視作恢復原有空間元素的手段。該族不單讓政府修繕一些廟宇及書室，他們也動用自己的資金修理古舊建築。舉例來說，他們在1991年花了430萬港幣修繕鄧氏宗祠。據政府與該族達成的協議，如果政府資助該宗族時，他們不能改變修復後建築的面貌。鄧氏只讓政府修復書室、廟宇和那些被視為重要性不及兩座宗祠的建築，而他們則自行資助修復鄧氏宗祠，以繼續掌有決定空間意義的風水元素。該族亦運用這些歷史建築物去證明鄧氏祖先是知書識禮的書香世代²⁵。

該宗族與古物古蹟辦事處充分合

作，開放自己的產業給市民參觀，從而參與了官方所建構的香港歷史。在人口已不算少的屏山地區，本地原居民容忍着因持續增加的參觀者人潮所造成的不便。鄧聖時說，有些時候他得先等遊客在門前的甬道走過後，才能打開自家的門。

該族亦尋求他們自己對本地史的詮釋。舉例來說，若經過預約，鄧聖時願意免費開放其父親及祖父的祖居給參觀者參觀。這些祖居不屬於文物徑，但卻與文物徑十分接近。在向參觀者開放自己的產業時，鄧先生讓參觀者對鄧氏，尤其重要的是對個體的生活有更多了解，這與文物徑以集體為焦點很不同。家族妥為保存的民房包括一個主房、兩個耳房、未婚女子的閨房、新娘房、穀倉、磨房及一個廚房。那是五代之前（即約160年前）建成的。鄧先生就是在這裏出生的。當文物徑在1993年開放時，他也向市民開放自己的房子。鄧先生把房子中的部分傢具移到其他建築，並將之重新安排以便展示一個家庭的日常生活。展覽品包括飲食器皿、烹調用具、衣服、傢具、祖先神龕、字畫及家庭照。大部分都用中文標籤解釋。據主房祖龕的一項標籤說明：

一望而知，中國人十分尊敬祖先，信仰神佛，所以祖先牌位被擺放在至高無尚的位置……中廳正中至尊的位置擺放着最華麗最莊重的木鏤神台、祖先牌位和錫香案。這種安排和我國各地並無二致，代表了最重要的民俗——孝德。

在鄧先生的詮釋中，他用的是「中國人」而不是華人或香港人。因此，鄧先生把展品所意指的「文化」連

上「我國」（中國），儘管他的文化概念完全是基於屏山的地方處境。

歷史建築及其相關的製品不單被用作建構集體的香港認同，亦是顯示中國臨現之暗碼。所以，這些建築的意義完全端賴於我們如何詮釋。在1995年12月17日，當我在那向公眾開放的屋子內拜訪鄧聖時時，他指着主房的祖龕說：「陳放在這裏的祖龕代表了一種中國風俗……中國人是認真敬祖的。英國人挖我們祖先的墓，惡意羞辱我們……由於英國人破壞了合作的基礎，所以我們關閉文物徑。」

鄧先生所指的關閉文物徑，緣於1995年8月10日政府在屏山稔灣移走兩座有兩百年歷史的鄧氏祖墳。為了解決未來25年香港垃圾堆放的問題，政府提出新界西部堆填發展計劃，而兩座墳墓正好座落在計劃預定地上。據政府稱，如果墳墓所在的區域被排除在計劃以外，則堆填區的容量將減少30%。若要彌補這個差額，政府將要多花12億港幣發展其他土地^②。政府與該族之間的談判在1991年開始。在1995年4月，政府以170萬港元作為鄧氏自動搬移墳墓的補償。該族則提出「風水交換」，要求政府拆除屏山警署並在原址興建公園。可是協議無法達成。政府下令該族在1995年5月28日前遷走墳墓，後來又把期限延至6月30日。該族開始不讓旅遊團進入（尤其那些由香港旅遊協會所組織的），以抗議政府的命令。

當政府移走他們的祖墳後，該族在1995年9月3日召開一次會議，商討對策。席上，他們決議關閉文物徑。族長鄧潤福就1995年9月26日關閉文物徑發表聲明，並在1995年10月7日將之刊登在香港各大報章上。據該聲

文物徑北端有一座建築：一座本地居民已棄置不用的社區公所建築，它象徵着1899年本地人對英國人的反抗。作為一個反抗的象徵，它顯然不能被港府納入對香港史的表述中。紀念，其實是一個選擇的過程。

在香港的脈絡中，若以殖民者及被殖民者的二元對立來研究殖民史，那恐怕會徒勞無功。香港史的表述過程（又或可說是集體的香港認同的建立過程），是由殖民主義、民族國家及本土處境之間的複雜關係所塑造的。

明，政府「強行以暴力損毀古墓摧毀古蹟，羞辱創造歷史古蹟的祖先及在現在奮身保護他們的人」²⁹。該族亦指責政府失信於民，沒有履行尊重新界風俗包括不應移走祖墳的承諾³⁰。

除了抗議政府移走兩座祖墳外，該族一再要求政府以拆毀警署作為賠償³¹。如果警署被移走，原先的風水便能得以修復，空間得以去殖民化。如果文物徑轉換了屏山歷史建築的意義，那麼，關閉文物徑則為鄧族創造了一個機會，重新協商被英國殖民化後所改變的新界空間意義。對文物徑的遊客來說，他們可以看到被政府精心引導的香港的過去；對屏山的居民來說，文物徑成為一個重新協商殖民歷史的手段。

屏山文物徑改變了敘述與社區之間的關係。本土及氏族取向的論述被香港取向的論述所取代。然而，儘管鄧氏仍樂於用他們的房子去闡述香港的歷史，他們並沒有放棄詮釋歷史的控制權。他們為遊客免費提供自印的本地史資料，甚至開放更多的產業給遊客參觀並舉辦自己的展覽。重要的是，他們掌有對文物徑上建築物的使用權，如果有需要的話，他們大可關掉該徑。

歷史的縈繞

在香港的脈絡中，若以殖民者及被殖民者的二元對立來研究殖民史，那恐怕會徒勞無功。陳清僑在對後殖民論述的批判中指出，香港不可能是後殖民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香港人及他們流行的想像「很大程度上仍受制於一系列未被察覺的規管制度，既或察覺，亦不會涉及他們的文化表

述的境況」³²。殖民主義是主要的規管制度之一。香港的歷史表述太緊緊於殖民主義，又或者是受制於殖民及近期的（後）殖民現代性。只有在表述香港（一個基於目前地緣政治界限的香港）過去的歷程中，文化認同的政治才可以被轉化。

香港史的表述過程（又或可說是集體的香港認同感的建構過程），是由殖民主義、民族國家及本土處境之間的複雜關係所塑造的。殖民主義的第一個環節是過去150年來英國對香港的殖民化。如本文已述，在時下撰寫香港史的熱潮中，作為書寫歷史的手段博物館展覽及歷史文物保存，皆被英國殖民主義所左右。一如「香港故事」所示，人與歷史的關係主要是從英國人的觀點來看，甚至「城市」歷史的開端，亦始自英國人（事實上是英國殖民主義）的到來，農村只是附從於城市的發展。展覽中的社會問題採納了殖民政府的觀點。主要關乎本地市民的問題，諸如娼妓、賭博及疾病，都是本地人口殖民化過程的重心；對比而言，種族主義及本地人抵抗殖民化政策等與殖民政府有關的問題，則永遠不會在展覽中出現。

殖民主義的另一個側面，涉及香港在1997年7月1日交還給中國。在這個脈絡下，非殖民化本身就是一種殖民化。這種諷刺的結果是源自英國對香港的殖民化。對中國來說，香港是中國過去與西方帝國主義交手過程中受辱的記號。英國殖民統治對香港人的意義遠不如中國政府眼中對大陸中國人那麼深遠。當香港在1997年7月回歸中國時，中國將會重新建構其半殖民的記憶。殖民主義的意涵將根據中國的論述來譯解。香港人是否被英國殖民者統治並不是中國關心的

問題。中國聲稱居住於香港的人是中國人，從而否認香港人的地方特色。換言之，香港人這一身分並沒有真實感。事實上，香港是為中國的利益服務。香港不同於中國其他地區，它使國內外的目光全聚集於中國身上。對中國來說，香港是將中國顯示於世界之前的一個最妥貼的場所。

在中國民族主義對待過渡時期香港的心態影響下，所有帶有殖民地色彩的論題將被再殖民化，即根據中國的需要，把蘊涵英國意識形態的主題解構，並重新演繹。香港的回歸已為香港人帶來巨大焦慮。對香港史及古蹟保存的表述，亦因1997年的來臨而變得像附魔一樣。「香港故事」所述說的年代以1984年為終結，然而，這一展覽的製作卻是在1984年之後才開始的。故被展覽的時間，唯有涉及1984年後的時段時才有意義。展覽的結語以中英兩種文字提醒參觀者1997年的幽靈。據英文版^③：

“With the signing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by Chin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 1984, China will resume sovereign over Hong Kong on 1 July 1997. Hong Kong is now entering a new chapter in her history.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will become even more prosperous if all her citizens can maintain their dedicated and hardworking spirit.*”

反之，中文版卻是^④：

一九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中國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香港正邁向一嶄新的歷史時期；我們相信：只要香港居民繼續和衷共濟，發揮奮發的精神，一定可

以克服種種困難，把香港建設成一個更繁榮、更昌盛的樂園。

九七的問題被轉化為九七的焦慮。這種焦慮清楚地顯示在中文版的結語中，它提及「困難」，但又沒有指明它們是甚麼。對九七的焦慮象徵着表述香港身分時的危機，這危機的具體表現為香港人在過去十多年中所經驗的「政治混亂」及「文化迷失」所引起的愈來愈少的選擇^⑤。書寫及教育香港史將據中國的需要而重新被設計。對中國而言，香港是在她的地緣政治範圍之內，灌輸香港人中國民族主義便成為首務。中國政府不認為香港居民的想法與中國民族主義可以並存不悖。舉例來說，政府不斷提醒港人甚至中國公民，港人欠缺民族、國家意識，他們亦不懂愛國主義。有鑒於此，重新安排香港意識形態空間便成為官方的首要課題。官方語言將是普通話，本地史將被放進中國國家史的脈絡中，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史將是這一國家史的焦點。最後，香港的文化空間亦將被中國民族國家所重塑。

殖民主義在書寫香港史的第三個環節繫於二十世紀後期資本主義，尤其是跨國資本主義的重要角色。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論證民族主義作為一政治身分的表述，包涵了政治自我意識，而這是來自民族國家的世界系統，那是指視民族國家為唯一合法的政治形式的意識形態^⑥。當然，在香港，政治自我意識不單繫於民族國家的世界系統，它亦繫於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特別注重民族國家的去疆域化 (deterritorialization) 的意識形態之語言，以此作為政治群體的另類可能。民族國家的去疆域化是一新近出現的現象，那是由民族國家與跨國資

在中國國族主義對待過渡時期香港的心態影響下，所有帶有殖民地色彩的論題將被再殖民化，即根據中國的需要，本地史將被放進中國國家史的脈絡中。最後，香港的文化空間亦將被中國民族國家所重塑。

本主義之間的互動所造成的，它轉化了全球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的角色，同時又在二者之間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在民族國家與跨國資本主義交織互動的情況下，香港政治自我意識的表達是由歷史再現及香港跨國資本主義的論述之間的交往所塑造的。在這資本主義的模式中，香港被表述為國際大都會，這從它在全球財務、經貿、電子通訊及船務各領域的獨特地位可以看出來。「香港故事」的「當代香港」部分即表達出這種強烈的資本主義態度。香港的成就充分表現於房屋、水庫、填海、娛樂、教育、電子通訊、交通、工業轉型、船務、政制改革等事情上。一個細小的展覽場地之所以能容納大量的資訊，是透過大量標籤、相片及多媒體達成的。

1990年代的香港歷史表述已是高科技文化工業的產品，它們本身就已是香港跨國資本主義的一部分。文化工業能把真實建構在所表述的內容之上。文化工業具有潛力及能力去加速不完整的意識形態之整合；能把想像的片段與情節轉化為可互換的及糾纏一體的題材，以供集體認同之用。換言之，香港的活力來自於二十世紀晚期的跨國資本主義及高科技。這種活力藉由維繫事物的秩序去黏合想像的香港社群。

香港資本主義藉着經濟投資及香港人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宣傳，使中國成為它的夥伴。「大香港」是顯示香港資本主義如何跨國運作的一個很好例子。「大香港」作為一地理經濟概念，是指在香港資本主義控制下的香港及中國廣東地區^⑧。「大香港」的能量來自香港資本家、中國政府及跨國

公司的複雜互涉關係。在「大香港」的意識形態中，廣東代表在中國開放政策及經濟改革中成就最顯赫的地區，它的活力有助中國推動長期而曲折的經濟改革過程，而這恐怕亦是東歐改革所要面對的問題^⑨。再者，在「大香港」的意識形態下，廣東經由輸入勞力與資金而將中國其他地區資本化。藉着諸如錄影帶、電影、電台、電視、報章雜誌等文化工業，「香港」的觀念及生活方式被傳播到廣東省及中國其他地區^⑩。商業主義及文化成為香港資本主義不可分割的一環。因此，「大香港」意識形態能幫助中國政府，亦能使「大香港」更大：香港資本主義所創造的成功故事，具有潛在的世界性意涵。

歷史表述所創造的文化領域，帶着文化認同的本質標誌。即使殖民勢力為香港人建立了基本的規範諸如政府、法律，但這文化領域卻為它的自主性劃下了界限。表述歷史常受制於文化領域的本土處境。英國殖民並不干擾香港跨國資本主義的文化領域，官方的歷史表述本身皆受制於本土的社會處境。賀米巴巴 (Homi Bhabha) 提醒我們，不同身分的規定及協商，都是在持續而偶發地重塑界限，並暴露任何聲稱差異的獨特性或自主性的限制^⑪。在香港新界的古蹟保存例子中，一如前文已述，鄧氏暴露了政府在文物教育上聲稱擁有香港獨特歷史的合法性的限制。換言之，在規定政府歷史表述的行動上，鄧氏藉由特定本土脈絡去表述或詮釋新界歷史建築之意義，以把編纂歷史轉換為一歷史過程。

「大香港」是顯示香港資本主義如何跨國運作的一個很好例子，在「大香港」的意識形態下，廣東經由輸入勞力與資金而將中國其他地區資本化。「大香港」意識形態能幫助中國政府推動長期而曲折的經濟改革過程。

註釋

① Ackbar Abbas, "The Last Emporium: Verse and Cultural Space", in Leung Ping-kwan, *City at the End of Time* (Hong Kong: Twilight Books Company in association with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2), 3.

②③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Union in Hong Kong ed., *Pictorial Record of the Exhibition of Chinese Products, 1939* (Hong Kong: The Central Press, 1939), 19; 20.

④ "British Empire Exhibition, Wembley, 1924 and 1925", in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Sessional Papers 1928* (Hong Kong: Noronha & Co., 1928), 3.

⑤⑥ The British Industries Fair Committee, "Report on Hong Kong's Participation in the British Industries Fair, 1948", in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Sessional Paper 1948 Part II* (Hong Kong: Noronha & Co., 1928), 26; 29.

⑦ John D. Young, "The Building Years: Maintaining a China-Hong Kong-Britain Equilibrium, 1950-71", in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1842-1992*, ed. Ming K. Chan (Hong Kong: M.E. Sharpe, Inc., 1994), 140.

⑧ 《華僑日報》，1969年12月13日，引自 *Festival of Hong Kong Commemoration Magazine 1969* (Hong Kong: Universal New Agency, 1969), 41.

⑨ Ching-hin Ho,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A Challenge in A Fast-Changing City", *Museum* (Paris), vol. XL, no. 3 (1988): 141.

⑩ 丁新豹：〈香港博物館口述歷史計劃簡介（一九八七年至八九年）〉，載香港教育署輔導視學處中文及中史組：《香港文史通訊》（香港），1994年創刊號，頁59-62。

⑪ 「香港故事」的展覽小冊子。

⑫ *Hong Kong Urban Council, Urban Council Annual Report 1991-92* (Hong Kong: The Public Infor-

mation Unit Urban Services Department, 1992), 102.

⑬ 展覽標籤。

⑭ 展覽標籤。

⑮ Susan Buck-Morss,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9).

⑯⑰⑱ *ibid.*, 39; 39; 39.

⑲ Michel de Certeau, "History: Science and Fiction", in M. de Certeau, *Heterologies: Discourse On the Other*, trans. Brai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205.

⑳ 參見 Anthony Ng, "The Role of Architects in Conservation" 一文。該文發表在1991年10月10-11日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的 "The Future of Hong Kong's Past—A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會議中。

㉑ 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印製《屏山文物徑》小冊子，沒有頁碼。

㉒ 該公所是用來組織對英國佔領該區時作反抗之用，尤其當英國人要在該地建警署時。屏山本土居民在一個通報上表達其對英國人佔領的反應：「我們痛恨英國鬼佬侵入我們的邊界及佔領我們的土地，並造成我們陷入無窮禍患中。日夜擔驚受怕。人們當然很不滿，並決定去反抗鬼子。若我們火器不夠好，我們將無法從事反抗。所以我們找了一塊空地，召集志士們演練火器，並以獎賞策勵。我們一方面幫助政府，另一方面，我們也使我們免於將來有麻煩。我們全體親友帶齊火器到該處，用盡一切方法根除逆賊。」參見 "Despatches and O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Extending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in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Sessional Papers 1899* (Hong Kong: Noronha & Co., Government Printers, 1900), 6.

㉓㉔ Michael Herzfeld, *A Place in History: Social and Monumental Time in A Cretan Tow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37; 37.

㉔ See written statement by Ng K'i-ch'eng dated April 21, 1899, in "Despatches and O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kong",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Sessional Papers 1899*, 45.

㉕ 布政司署會議記錄，1899年4月20日，同上，頁40。

㉖ 鄧聖時：《屏山故事初探》（香港鄧氏，1993），頁20。

㉗ Ng Kang-chung, "Trail Closed in Grave Row",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May 19, 1995.

㉘ 《星島日報》，1995年10月7日。

㉙ 在一份1899年4月4日發布的聲明上，兩港總督談及廣東總督陸徵祥通知原居民新割讓地界：「九龍根據大清皇帝命令割讓，據總理行門所製的地圖去劃定邊界，並與外夷達成協議如下：（一）待民必從慈；（二）不能強迫出售土地及房屋（三）墳地永不准遷移；（四）土地風俗習慣不能擅改。因此割讓土地的鄉鎮與國內無異。本通告志在知會大眾，從今，國內鄉鎮市集與割讓區內無關。無人可誤導人心，汝等一切於割讓區內的鄉鎮百姓應依汝等所在地法令謀生。若有不服從聖上詣令而圖惹事生非者，區內所駐大軍將拘捕與治罪惹事者無疑。」在港督卜力(H.A. Blake)爵士所領導的立法局開會前，已將此聲明公告各方。並公布於*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Sessional Paper 1899*。在1898年，當新界正式割給英國後，區內主要宗族都組織本土居民進行反抗，攻擊英軍。在英國要求下，清廷向區內百姓發出此通告。所以看來，英國政府應是同意中國官員所發布的聲明內容，儘管這沒有明確說出來。

㉚ 在1996年2月，協議還沒有達成。

㉛ Ching-kiu Stephen Chan, "Cultural Studies in a Still Colonial Context: Imagining Hong Kong between World and Home", in *Marginality, Postcoloniality and Counter-discourse*, a special issue of *Shue Yan Journal of English/Cultural*

Studies (Hong Kong), 1 (Fall 1995): 61.

㉜㉝ 我自己的著重點。

㉞ Stephen Chan, "Future Un-Imagined", *Hong Kong Cultural Studies Bulletin* (Hong Kong), 4 (Winter 1995): 20.

㉟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69.

㊱㊲ Yun-wing Sung,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Hong Kong Guangdong in the 1900s", in *The Hong Kong-Guangdong Link: Partnership in Flux*, eds. R. Yin-Wang Kwok and A.Y. S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244-50; 249.

㊳ See Gregory Eliyu Guldin, "Towards a Greater Guangdong: Hong Kong's Sociocultural Impact 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Beyond", in *The Hong Kong-Guangdong Link: Partnership in Flux*, eds. R. Yin-Wang Kwok and A.Y. So, 89-118.

㊴ Homi Bhabha, "How Newness Enters the World: Postmodern Space, Postcolonial Times and the Trials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H.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219.

我要感謝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及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對我在香港進行研究期間的支持，特別要感謝 Dr. Elizabeth Sinn, Coonoor Kripalani 小姐及熊景明女士的支持。我也感謝Lisa Hoffman及Harriet Phinney對本文早期版本的建議。

任海 1965年生，四川成都人，曾任職四川大學博物館。現為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社會文化人類學博士研究生。